

党史地名学研究

DANG SHI DI MING XUE YAN JIU



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党史研究室

《党史地名学研究》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茂

副主任委员 刘利东

顾问委员 孟祥林 张振岭 金文杰

林宗泽 李成海

编辑委员 高金山

主 审 蔡永茂 刘利东

主 编 高金山

编 辑 高金山 李红英 高艳丽

校 对 高金山 李红英 高艳丽

序

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书记 李寿平

在全国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之后,又迎来了李大钊诞辰 115 周年、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万里长征开始 7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5 周年纪念日。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这些节日的同时,恰逢路北区委党研室建室 20 周年。路北区委党研室编辑了《党史地名学研究》一书,作为献给一系列纪念日的礼物,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路北区委非常重视党史工作,20 年来,一直坚持“存史、资政、育人”三大工程建设,并特别注意全面协调发展,党史工作形成了许多特色,为唐山市党史工作走在全省最前列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存史方面,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广泛征编资料,坚持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碑资料三位一体的征编形式,并把档案建设列为重要日程,取得一定成绩;在资政方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坚持调研、精神文明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堡垒联建一体化的形式,编纂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镜鉴;在育人方面,运用党史资料和编研成果,坚持党史进基层、举行纪念活动、开展讲课、筹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老干部功绩展等形式,对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历史教育,为培育跨世纪干部和四有新人服务,积累了较好的经验;三大工程建设在路北区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独

特作用。20年来,路北区委领导都非常关心党史工作,并且注意从“领导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办公条件到位”入手,关心党研室建设,对党史的编研成果,能坚持听取工作汇报,先后有四任主要领导为编研成果作序。路北区党史的许多编研成果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

路北区委党研室人员少,任务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目前,正在以纪念一系列活动为契机总结以往取得的经验,寻找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谋划新的工作目标,朝新的高度迈进,希望为唐山市党史工作走在全省最前列做出新的贡献。《党史地名学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从理论上探索了党史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展现了党进行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很有新意,值得一读,相信一定能够在路北区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让我们努力工作,奋发有为,开动脑筋,全面认识区情,把路北区的各项工作搞好,把路北区建设得更繁荣更美好。

绪 论

推进党史工作,要创新党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今年年初,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全省党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唐山市党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几个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各级党史部门要立足本职,开拓创新,在党史征编、研究、宣传和教育方面,以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党史部门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是推进党史工作的重要课题。这涉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涉及能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创新党史研究方法和途径;涉及努力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问题。因此,能不能创新党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正在现实地摆到党史工作者的面前,需要给予认真的回答。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创新党史研究方法和途径呢?我们认为,根本的做法是:应该紧紧围绕党史工作实践及其面临的任务,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各个方面探讨党史形成和发展规律。换句话说,对党史形成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愈深刻,就说明研究方法和途径越得体,就愈有利于党史学的发展。因此,应该重视党史科学规律形成的研究。党史地名学是介于党史学和地名学边缘的学科,是党史学起源、诞生、发展中借助的媒介性基础学科,既属于分支学科又属于独立学科,其重要内容,应该进入党史工作者的研究领域。

一、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对象

党史学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名学是关于地名景观和地名演变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地名和地名景观。党史研究离不开地名学的研究成果。

党史学与地名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上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地名景观是建立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史人物、党史人物籍贯、党活动地区、党组织策源地、党组织的驻地、党代表大会召开地、与党组织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有关的历史事件以及党员交往的地点、与党史事件发生地相联系的社会地理实体等,展现出中共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引方向彻底反帝反封建为特点的;以党史地理实体、党史地名为纽带进行,表现相联系、相区别特征的,割断这种联系、区别,党史学科无法建立和形成。联系性、差异性成为党史地名学出现的基础;从区别上说,地名标示地理实体的实在。党史学科涉及的各类地理实体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都离不开地名标示,也就是说党史在自然地理实体、社会地理实体、专业地理实体上发生、发展,与自然地名、社会地名、专业地名相联系、相关联,成为党史事件,又通过党史事件与地名的紧密联系表现党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党史学是建立在地理实体及其地名基础上的学科。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候开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壮大一刻也没有离开地理实体,同时影响了地名的命名、更名。党史地名形成景观,并从自然地名、社会地名、专业地名中分化出来,成为党史学的一个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展现的成果准确与否、科学与否直接制约着党史学的科学性、全面性。科学性、全面性是党史地名学诞生的条件。

党史地名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和条件上,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指导规范自己的学科科学发展的作用,并具

备着独立学科建立的体系和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党史地名是语言,是思想的火花,是语言的实践,反映党的一种实践活动。系统地掌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必须准确地把握地名学与党史学的关系,以地名为媒介、为窗口去研究,否则就不能成功。党史地名学是党史学的分支,它从解释某些具体地名的起源演变,研究历史发展,其处在党史学与地名学的边缘上。目前,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对党史地名学研究甚少,甚至对党史地名和党史地名学不大关注,从而使研究工作建立在盲目而不自觉状态中,这就使许多研究成果一直处于某种模糊状况中。党史地理实体及其地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意识的使用和伴随党的早期组织出现而诞生的。一般认为,中国早期党组织是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的途中由双方商讨约定后分别建立的,这就因南陈北李而诞生了党史地理实体的南、北命名意识,南陈北李的行动路线及李大钊与陈独秀离开北京和天津时,是不是到过乐亭,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党史地名学的谜。之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相继出现党史地理实体即早期党组织,党史地名也就伴随早期党组织建立开始出现并从普通地名中分化出来,按照自身运动规律发展,区别了旧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早期党组织诞生地有没有哈尔滨、天津也一直受到重视。正是因此,早期党史地名既有普通地名的性质,又有党史学科的特征,从一出现开始,就反映着社会性、生产性、群众性观点,同整个社会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成为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人民群众创造了党史地理实体,创造了党史地名,创造了党史,党史地理实体和地名适应了党的工作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党史工作者专门把党史地名作为研究对象时,党史地名学也就诞生了,并且开始制约党史学研究的质量。从党史学发展看,党史地理实体数量不断增多,经过了人民群众实践检验;党史地名学研究对

象不断扩大,地名命名、更名、正名等工作尊重了人民的传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学的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变得多彩。

党史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是党组织和个人从事革命斗争和活动的历史空间名称。这里所说的历史空间名称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也不只是指这个具体地名所标示的范围,而是与党史事件相联系,表示组织和个人活动地域并被特定范围内人民群众所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名。党史地名学是在党史地名作为学科研究对象后产生的,党史地名是人类社会及其地理空间的所有地名的一部分,是党组织和个人从事往来、交际、活动的媒介符号,没有地名,党史无从谈起。所以,党史地名的整体也就形成党史地名景观系统。换句话说,党史地名景观是党史地名的整体形态,既包括历史的又包括现实的,那些只要与党史学有关的地名,都应该是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党史重要人物的家乡、党史重要人物的活动区域、党史重要人物命名的地名也是党史地名的一个类别,比如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村、邓小平出生的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王尽美出生的山东省莒县北杏村、邓恩铭出生的贵州荔波县水堡、李大钊出生的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等都是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内容。由所有的党史地名也就是党史地名的整体构成的景观叫党史地名景观。党史地名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研究系统,具有普通地名学的特殊属性。这就是说,党史地名景观是整体的,也是局部的个性的,比如,唐山市是一座震后兴建的新城,构思地名景观时,保留了一批震前命名的意愿地名,爱国里、增盛里、新华路、解放路、胜利路等,命名了一批表现新意愿的地名,健康楼、南新道、北新道、和平里等,理想意愿形成唐山市地名景观特色,区别着其他城市的个性。换句话说,党史地名景观是由无数个个性化景观构成的。

党史地名学是关于党史地名起源、命名、更名、考证、沿革、管理的科学学科,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比如《李大钊在河北革命

活动综述》一文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李大钊多次到唐山煤矿与工人谈心后写成的。唐山读者胡庆余看后,根据李大钊在文中的叙述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北京听一位朋友述说写成的,不是根据自己调查写成的”。这样,有关唐山煤厂的研究成果就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就需要考证,就需要探索,素材究竟取自何处就成为研究方向。后来,经过编辑部与作者反复核对,作者公开承认胡庆余的说法是对的。这样,一篇由党史地理实体和地名产生的研究成果才被澄清,党史地名的科学性才得以保障。把党的组织和个人从事活动的场所、驻地,把党史人物的籍贯及其演变沿革,把党史地名区域分布和地名景观特色等作为研究对象,党史地名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才会诞生。也就是说,把党史地名作为研究对象才有党史地名学诞生的标志。

一个学科只有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才能确定研究范畴,才能确立学科的位置。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了学科的位置,将成果综合、利用,使之更丰富、不断发展,学科的基础才会巩固。遵义会议会址确认就经历了一个反复考证的过程。党史工作者通过对天主堂、柏公馆的反复研究、核实,才最后确认,遵义天主堂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柏公馆是遵义会议会址。这个确认过程是党史工作者对党史地理实体、党史地名反复研究的过程,其成果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党史地名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党史地名学与地理学、语言学、地名学、社会学、历史学相联系,是党史工作者从这些学科的边缘中把党史地名组合起来进行研究,用于规范党史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时空内容。由于党史学吸收党史地名学的研究成果,并用它来规范研究内容,所以学科的成果就会更加科学。理论化、系统化是党史地名学追求的目标和任务,在客观条件下,将党史地名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综合考察,慎重地区别不同结论,在考证、推导中得出正确结论,党史地名学的成果就具有了普遍的适用性,能够给党史工作者以学习、借鉴、研究的科学指导。

二、党史地名学的基本属性

党史地名是人类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产生又伴随党组织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它是由党史地名意识不断构思而出现的。党史地名意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断孕育才诞生的,中共早期组织在特定的地名景观中,成为党史地名存在的第一批地理实体,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法国、俄罗斯便成为第一批党史地名的策源地,改变着某些地名的一般属性,而表现标示党史内容的特殊属性。伴随中共组织发展,党史地名词不断增多并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具备了自身的时空扩展性,成为社会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

党史地理实体具备社会属性。党史地名词总量构成的党史地名景观是在逐渐吸纳部分普通地名基础上,经过党组织和党员使用而不断增加,并成为具有社会普遍属性的景观。这个景观基础的沉淀过程很长,并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体发生变更,学堂名称亦作了重新规定,原来的学堂一律改为学校,官立改称国立、省立、县立,使全国一批学堂改为学校。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奉命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又将高等师范建制撤消,山东高等师范改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济南北园双桥寺附近成立分校,习惯称北园分校;山东私立山左公学堂、济南私立公励中学堂、济南官立中学堂合并改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社会地理实体孕育着早期党组织。北京党组织到长辛店、唐山、天津工人中宣传主义,改组群众团体,促进了党的意识在各进步团体中的吸纳和发展。北大、北大图书馆、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天津觉悟社、北京陶然亭、社会主义青年团丰富着党史地理实体的源头和数量。陈独秀在上海编辑《青年杂志》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说,《青年杂志》与该会《上海青年》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错误。陈独秀接受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建议,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

《新青年》成为反映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情况的有影响的刊物。上海厚生纱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业总工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工人俱乐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等一批社会地理实体很快具备了向党史地理实体转变的条件。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便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联系,在筹建的过程中,先组织了一个“励新学会”,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并加强了对齐鲁书社、齐鲁通讯社的工作,使齐鲁通讯社、齐鲁书社、励新学会、康米尼斯特学会等社会地理实体具备了向党史地理实体转变的条件。这些党史地理实体又通过积极分子联系山东省立一师、山东省立一中、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党史地理实体不断扩大,为党史地名的出现增加着社会属性。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与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等建立了济南共产党小组。济南共产党小组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党史地名。1921年初,京奉路唐山职工学校建立,并与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开滦煤矿有了联系,由于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努力,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产业工会等组织相继出现,使社会地理实体向党史地理实体转变的条件更加充分。天津组织唐山站分部成为唐山市第一个党史地名。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写道:“天津组织及唐山站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上这个最大车站(指天津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党史地理实体和党史地名的出现规范了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属性。这时,党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党史地名的社会属性是有限的,既有普通地名的社会属性,又有专业地名的专业属性,有限的社会属性正在向全民性、全社会性发展,而专业属性则区别着党史地名的类别。刘志丹是陕甘根据地和西北工农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6年4月14日,他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逝

世,人们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纪念刘志丹烈士;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将领。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牺牲。1946年,东北人民将吉林濛县改为靖宇县,以纪念杨靖宇烈士;谢子长是陕北的著名党员。1935年,人们将陕西省瓦窑堡改为子长县,以纪念谢子长烈士。1942年,将山西辽县改为左权县。这些原来只是记述党史事件的普通地名因为纪念历史上的革命烈士,使进行的命名、更名工作增加了新的特点,人名构思成地名,使党史地名的特色更加鲜明。此外,辽宁金县改为向应乡、湖南汨罗设立弼时公社以及黄骅港、大钊公园等的命名,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反映着某个时期这一地域的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和崇敬,这样的党史地名景观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党史人物敬仰基础之上的,一经出现就变成了全党的、全民的、全社会的,具备了地域性、排他性。全民性、地域性、排他性是党史地名社会属性的基本内容。

党史地名具备使用的强制性,一旦形成稳固的词汇,国内、国外、内政外交、社会团体、党政部门、各行各业都要使用,并必须用它做交际往来的工具和媒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交际的目的。党史地名使用的强制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语言的完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主张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对那些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地名进行了更名。更改后的地名强制性很强,要求社会必须遵守使用。因为,党史地名工作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尊重了人民群众的传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如安东改为丹东,镇南关改为睦南关,都是受人们欢迎的;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不得随意更改地名,破坏地名使用的强制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立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地名管理中出现过由于人们对美好事物追求而强制更名的现象,如开滦矿务局改为红旗矿务局、启新水泥厂改为四二二水泥厂、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等,红旗矿务局、四二二水泥厂、反修路等地名虽然使用过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固定下来,后来不得

不又改了回来。这并不是因为地名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开滦矿务局、启新水泥厂经过百年创业,创出了自己的品牌,使国内外消费者愿意使用这些企业的产品。你改了名,人家以为是新企业、新品牌,市场不认。地名的社会性、强制性决定了党史地名的生命力,特别是那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名,生命力就更强,历史事件一旦使普通地名成为党史地名,人们就会永远不能忘记。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迅速成为党史地名;1975年,越南出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强行将南沙群岛改为长沙群岛,将西沙群岛改为黄沙群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一下子成为反映中越两党关系的党史地名。这些党史地名记录着特定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无论如何,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可见任何破坏党史地名社会性、强制性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三、党史地名学的研究任务

党史地名学是伴随党史编研工作而兴起的。在长期的党史研究中,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一直是党史工作者探讨的课题。最早的党史著作都说: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贝勒路3号,毛泽东、周佛海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博文女校,贝勒路当时在法租界。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在回答关于中共一大问题时告诉何叔衡: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样,上海——嘉兴成为党的一大开会的地点。可是,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嘉兴并没有东湖。“东湖”与党史事件有关,无疑成为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内容,东湖的有无成为党史研究的课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36年7月,陈潭秋在一篇讲话稿中仍然坚持党的一大是在上海召开的,他忽略了另一个开会和闭幕的地点。党的一大究竟是在上海一个地方还是在上海、嘉兴两个地方召开的,一度成为党史学争论、研究的焦点。1991年8月,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时,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最后一天的会

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肯定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两地先后召开的历史事实，同时纠正了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东湖召开的错误，因为嘉兴只有南湖而没有东湖。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沿袭了胡绳的结论，表述时说：“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召开，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结束”。党史著作中关于一大召开地点的探讨过程说明党史地名学建立的重要性。上海、望志路、兴业路、贝勒路、树德里、嘉兴、东湖、南湖都曾成为党史地名学研究的对象，大会闭幕经历了由嘉兴东湖到嘉兴南湖的研究过程。党史地名成为党史工作者的研究对象以后，党史地名学便产生了，不管你承认与否，它都制约你的研究成果。1922年暴发的唐山地区的路矿同盟大罢工是党史中第一次工运高潮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名称也有许多提法：《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称开滦煤矿工人罢工；邓中夏回忆文章称“开滦五矿大罢工”；吴佩孚镇压电称“唐山罢工”；共产国际马林使用“唐山罢工”；罗章龙回忆或称“开滦罢工”或称“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唐山地区同盟罢工”；王德舟回忆称“开滦同盟大罢工”。一个事件涉及到的党史地名极不统一，既有开滦煤矿、开滦五矿、唐山，又有唐山、开滦、唐山开滦五矿、唐山地区，造成党史著作中一个罢工事件使用不同名称现象。实际上“唐山地区路矿同盟大罢工”的概念比较符合历史，也接近现实，地名使用相对准确、客观，但是仍不能包括当时参加罢工的启新水泥厂、华新纺纱厂、唐山陶瓷厂等工厂，因此也就降低了党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性、科学性、准确性。党史地名研究是为党史编研、党史工作服务的，所以，党史地名使用时一定要全面、科学、准确。否则，研究成果就会有局限性。用不全面、不标准、不科学、不准确的党史地名表述出来的编研成果是不会全面、准确、科学的，是有局限的、不客观的、缺乏科学性的。

党史地名研究具有超前性特征。党史地名研究是解决党史编

研究工作使用地名规范不规范、科学不科学、标准不标准而产生的。提供标准党史地名,可以基本保障党史著作的准确性、科学性、规范性。使用标准党史地名,可以避免多说并存。也就是说,提供和使用标准党史地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史地名学的基本任务。

党史地名研究具有基础性特征。党史地名研究是建立在搜集、整理、分析、考证基础上的工作,经过比较研究而选择确立的党史地名成果,是党史科研的成果,是党史工作的成果。只有抓好党史地名研究这一基础性工作,才能保证党史编研工作的基础,才能保证党史工作科学地向前发展。加强基础性党史地名研究工作是党史地名学的基本任务。

党史地名研究具有科学性特征。党史著作中使用的党史地名是经过考证、比较、研究才确定下来得到社会公认的成果,因此,用它研究出来的党史才是科学的。使用规范党史地名、使用科学党史地名、使用标准党史地名是保障党史编研工作顺利进行,具备充分准备基础条件的前提。用标准党史地名、用规范党史地名编研出来的党史著作是具备科学性特征的。具备科学性是党史地名学的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首先,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应该以党史地名为先导,了解党史地名的出现、形成、发展、分布规律;其次,通过党史地名内涵的基本知识去深入研究党的光辉历史。因此,学好党史地名学就成为搞好党史研究和编研的重要条件。通过对党史地名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培养起爱国爱党思想,而且能够帮助了解党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比如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到城市规律的认识,就离不开对具体地名的了解。珍惜党的历史成就和文化遗产,学习党的刻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珍惜党的三大作风和纪律,学习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珍惜党不畏强暴,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光

荣传统,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就可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第三,党史地名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历程,凝聚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人们通过地名了解了这个历程和故事,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光辉业绩。因此,地名常常与精神联系起来,供人们学习。用这种方法命名的精神有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西铺精神、沙石峪精神、唐山抗震精神,将精神与地名相联系,扩大了地名的本义和内涵,形成了民族魂,我们应该重视地名的这种使用方法及其影响。由地名演变成的精神也是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内容。

目 录

序	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书记 李寿平(1)
绪 论	(1)
一 党史地名学的研究对象	(2)
二 党史地名学的基本属性	(6)
三 党史地名学的研究任务	(9)
第一章 党史地理实体的出现与党史地名的起源	(1)
一 党史地理实体的出现	(1)
二 早期党史地名诞生与区域分布特点	(9)
三 党史地名景观的形成与主要形式	(15)
第二章 党史地名的类别与景观的扩大	(23)
一 国共合作思想对党史地名景观的影响	(23)
二 党史地名景观变化的特点	(28)
三 党史军事地名增加与党史政权地名的出现	(34)
第三章 工农武装割据与党史红色区域的出现	(40)
一 工农武装割据与革命根据地	(40)
二 红色区域建设与党史地名的特点	(49)
三 革命根据地地名景观的形成	(54)
第四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名管理	(60)
一 沦陷区的出现与蒋军对苏区的破坏	(60)